

轻叩名门

罗文华

世相百态

王国华

涛声依旧

徐冰

旷世美学家朱光潜



美学家朱光潜

我在北大上学时的宿舍楼位于校园南部，从那里去西北方向，比如去五院中文系办事，去俄文楼上课，去西校门内的办公楼开会，穿越燕南园是最为近便的。但同学们都很自觉，只要时间来得及，就尽量不穿越燕南园，宁肯绕点几道；确有急事，要抄近路穿越燕南园时，也是悄然而行，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。

“大师未必都住燕南园，但住燕南园的必定都是大师”。有人统计过，八十多年来，历史学家洪业、翦伯赞、齐思和，数学家江泽涵，物理学家周培源、饶毓泰、褚圣麟，经济学家马寅初、陈岱孙，哲学家冯友兰、汤用彤、冯定，化学家张龙翔、黄子卿，语言学家王力、林焘，美学家朱光潜，生物学家沈同，法学家芮沐，文学家林庚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，这些大师都曾在燕南园居住过。他们或居一座西式小楼，或住一套中式庭院，待遇优渥，生活安逸，在各自的书斋里做着各自的学问。燕南园虫鸟常憩，草木悠然，好似世外桃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燕南园周围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商店，园里的主人们又多至古稀之年，很少走动，整个园子更显得异常幽静。那时，我所见进进出出燕南园最多的老人，就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了。

我聆听朱光潜先生的教导，是在北大图书馆外的长椅上进行的。

那时我整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里，与馆里的工作人员处得非常好，他们就在理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给我设了个专座，极大地方便了的学习。我的专座是一把形制高大的明式太师椅，看书间歇，举目窗外，可以俯瞰图书馆东草坪全景。当时图书馆东门外还庄严地矗立着毛泽东的巨大塑像，塑像前面形成一个小广场，广场靠近草坪处设置有两排长椅。有一个时期，朱光潜先生时常在午后从燕南园出来遛弯儿，走到图书馆东边，就坐在朝南的一个长椅上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我从阅览室的窗子一见到朱先生出现，就下楼出馆，坐在长椅上与他聊天。有时馆里的工作人员看见这位瘦弱矮小的老人，也会提醒我：老先生在那儿等你呢。

我的印象中，朱先生是一位亲切随和的长者，喜欢和学生谈心，很有兴致与耐心。他的安徽桐城话说得比较缓慢，但眼睛里却时常闪烁着睿智的光芒，让人无法不专注地倾听他说话。在看似轻松愉快的闲聊里，他那深邃的思想就不知不觉地流入了我的心田。当时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同学们几乎是人手一册，叶朗的《中国小说美学》同学们也很关注，我就这两本书的内容向朱先生提过几个问题；更多的是请教有关朱先生自己著作和译著中的一些问题，包括他写的《西方美学史》、《悲剧心理学》、《谈美书简》，他翻译的《歌德谈话录》、莱辛的《拉奥孔》、黑格尔的《美学》等。朱先生有的详细解答，有的则用两三句话说出要点，给人留下深入思索和继续探究的空间。

朱光潜先生给我的启示是：研究任何学问，包括美学，都不能玩概念、套公式，或拘守于几个僵化的教条，不能坐井观天、画地为牢和故步自封。读书、做学问，不能脱离鲜活生动的实际。他极为欣赏朱熹的一首诗，并为我轻声吟诵过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他说起这首诗的末句写得尤其好，意味无穷。他指出，中文系的学生特别要注重学习西方的学术经典，善于批判性地接受与继承人类文明成果。朱先生的谆谆教诲，对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深远，我们在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，自觉地抵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。我永远记得，1986年，八十九岁高龄的朱先生在逝世前三天，神志稍许清醒，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，家人发现急忙劝阻，他却说要赶在死前把他翻译的维柯的《新科学》的注释部分完成。他多次说过，《新科学》对于中国太重要了。

我的同学、著名媒体人阿忆深情地回忆说，曾经有两次，当他穿越燕南园时，朱光潜先生隔着矮墙送给他一朵小花。我和阿忆都认为，那不是一朵普通的花，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，是一代宗师临终前无言的暗示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，把旷世的风范播撒在晚辈的心中。

蠹鱼

世间万物皆有天敌。书籍的天敌除了秦始皇等不喜欢书的人以外，还有一种动物，叫做衣鱼。百度百科上讲：“衣鱼，是衣鱼科昆虫的通称，一类较原始的无翅小型昆虫，全世界约有100多种。衣鱼的个体发育过程经过卵、若虫和成虫三个时期，属于表变态（昆虫不完全变态的一个类型）。俗称蠹、蠹鱼、白鱼、壁鱼、书虫。”有人被骂作书虫，就是被指认为这样一种昆虫。

蠹鱼到底长什么样呢？估计现代人见过的不多，因为蠹鱼爱好富含淀粉或多糖的食物，如，糨糊、书籍装订物、照片、糖、毛发、泥土等，但如今出版的书所用纸张不像以前那么纯粹了，既不含淀粉，也不多糖，多的是莫名化合物。蠹鱼们与其与时俱进，跟头把式地调整饮食结构，还不如干脆吃点别的。再说，书籍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主食，仿佛饥民生活中的土豆、地瓜，救急用的。其实，即使蠹鱼继续吃书，人们也不见得恨之入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读书人跟蠹鱼都在吃书，彼此应有惺惺相惜之感。

英国作家威廉·布列地斯在《书的敌人》一文中列举了自己见到的和听闻的几种蠹鱼。“它喜欢潮湿和温暖，嗜食任何纤维物质。……不过我推测它如果不十分强壮，油墨对于它的健康便不很适合，因为我发现在有字的地方所穿的洞，它的长度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食料以供幼虫发展变化之需”。一八九九年，有位友人邮寄了一只肥壮的小书虫给作者，作者将它养在一只小盒子里，并且给了它一些碎纸片。“它将书页吃了一小片，不过不知是否由于新鲜空气太多，还是不习惯这样的自由，还是因为食物改变了的缘故，它渐渐地衰弱起来，终于在三个星期之后死了”。一八八二年，大英博物馆一位博士送了作者两只书虫（奇怪，为什么总送这种东西？），其中一只很快就死了，另外一只坚持了十八个月。这使得作者可以近距离打量这只小虫。“我竭尽我的能力照料它，将它放在一只小盒子中，选择了三种旧纸给它吃，很少去惊动它。它显然不愿过这样幽禁的生活，吃得很少，活动得很少，甚至死了以后的样子也改变得很少。……它是透明的，像一片薄象牙一般，身上有一条黑线，我猜想这大约是它的肠子。它非常缓慢地丧失了它的生命……”

总体上看，蠹鱼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柔弱，同时对环境的要求也很高。我感觉，这跟读书人差不多。真正的读书人，躲在世界一角，干点自己喜欢的事，就算再落寞也不靠伤害别人来救赎自我。写到这里，脑子里忽然无缘无故冒出一句话，宁要无害的蠹鱼，不要有害的学者。

成语重组

陈长林

呆若木人



陈丹青2002年首次在“美术同盟”网站与艺术青年在线交流，网友克雷问：“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啊？”陈丹青以两个字作答：“发呆。”

乍听以为陈丹青是在“逗你玩儿”，其实，陈丹青是给你支招儿。发呆并非丑陋，反是一种享受，那一刻，我的时空我做主，放开所有，抛弃烦恼，卸掉忧愁。心理专家说发呆属于正常人一种心理调节，无伤大雅，有益健康。因为发呆能创造纯净自我空间，冥想可促进血液循环，为组织器官输送大量氧气和营养，可以减少焦虑，减轻压力。

如果说，小时候，“多少的日子里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”，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被动色彩，迹近无奈；那么，工作后，寻找一个度假村，自我隔绝，主动发呆，则是一种时尚追求，显露本领。发呆者择时择地发呆，意在扫除生活烦恼，埋葬情绪垃圾，收拾心情上路，重新应对压力。

美国《预防》杂志介绍过八种简单方法，有助于增加人体免疫力：“充足的睡眠；保证30分钟的运动；定期健康按摩；适量的维生素C与E补充；不乱用抗生素；每天饮酒量不超过一杯；有三五知己畅叙心思，每天做几分钟白日梦。”“做几分钟白日梦”，外在表现不就是发呆么？因此千万不可小瞧那些时常发呆者，说不定人家才是养生达人呢。

城市的不同时空



北京老胡同

周日，我和家人又一次来到雍和宫。雍和宫是北京著名的寺院，在藏传佛教中，也拥有重要的地位。加之在许多人的看来，雍和宫有着异于其他寺院的灵验，游人如织、香客盈门，似乎任何时候，其庙门都挤满了车。

但我的兴趣并不在游览。雍和宫以及周围的胡同，之于我，有着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1994年，当我毕业来京，第一个单位，就栖身在与雍和宫几步之遥的胡同深处。那里也有一座寺院，名叫柏林寺。

我至今清楚记得犹豫地走在雍和宫外的胡同，踏入柏林寺的那个场景。前面不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，但那一刻，老北京的生活第一次如此近在眼前，而随后的几年，我也的确置身于老北京的生活场景之中。胡同，第一次于我有了现实的触摸。

那是一种温馨而难以融入的生活。一辆自行车，就可以穿行在复杂的曲折之中；足不出胡同，就可以解决单身汉的吃喝拉撒。大有别于地图上的北京，胡同中的北京，完全是另外的天地。这也是我关于北京印象的最突出感受。我一直认为，北京不是这两个汉字可以涵盖。尽管由于皇城根子民的优越感，北京人给人留下了难说美好的印象。但究竟又有几人，真的有机会生活于北京人的生活呢？即便我这个在北京已经近20年的人，至今也无法说自己已经成为了北京人。

相比于北京人、外地人的简单划分，我将生活于北京的人分为北京人、外地人、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，说实话，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区分有什么道理，但这确实是我力所能及的划分——北京是一座开放的城市，因为她聚集了天南地北之人；而说北京是一座封闭的城市，则因我们其实很难真正进入北京的灵魂。抑或，这种若即若离、属于我而又不属于我的飘忽，才是北京今日的靈魂？

我无力对北京进行什么理性总结，但对于自己走过的胡同，却有资格向妻儿炫耀般介绍。你看，这是藏经馆胡同，那边的铁门，就是我曾待过几年的柏林寺，我第一个单位就在那里面，当然现在也搬走了。过去那个铁门往里拐，是炮局胡同，那里面有个监狱，清代就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，至今，据说还是关押重刑犯。不知道为什么在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，竟然还有这么危险的处所……

格局依旧，十几年了，比之于几步路外人们惯常认为的北京，变化实在不大，就连拐角处那个老式的粮店都还那个样子。这使我有些惊异，这十几年，是北京大建设的十几年，房价都涨了几倍了。关于发展的速度，于此约略有些让人感慨的对比。可更加让我有点怪异幽默的是，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相对论，“洞中方数日，世上已千年”。假如一直待在胡同里不出来，是否真的会有沧海桑田的感受？

但这并不是“观棋烂柯”的现实故事，胡同不是神仙洞，北京也不是烂柯山，这是人间，是真实的人间。

变化自然也有——胡同里住房的外墙粉刷了，那是奥运会留下的，我将之看作属于我的“北京欢迎你”，虽然有些怪怪；胡同里停的汽车多了，几乎占据了半个路面，十几年前没有这个景象；胡同里多了几家香烛店，几步外就是雍和宫，有这种店实属正常，但十几年前的印象里却没有。表面感觉，胡同人家的商业意识远远跟不上北京的步伐。我无法解释这种脱节，近在咫尺的胡同口，即可见另外一个北京。围绕香火繁盛的雍和宫，各种佛事用品店鳞次栉比。1995年，当我第一次去西藏，同行的人在拉萨八角街上成捆购买低质的唐卡，运回北京转卖给这样的小店，至今，据说也还有如此营生者，可见生意之好。但这一切的繁荣，似乎都仅限于临街一面，站在胡同口往里一瞧，无密可保的大杂院生活依然活生生乱糟糟，亲切、俗气、真实。

究竟哪一个才是北京呢？胡同口，就是时空的界限？是复杂的、难以理解的相对论的通俗的解说？